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郭军宁 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许 新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郭军宁 编写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1,000字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1041-7/K·153 定价：1.10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郭军宁 编写

目 录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1)
- 二、共青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6)
- 三、共青团在土地革命斗争中..... (17)
- 四、共青团的改造和重建..... (23)
- 五、青年团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时期..... (34)
- 六、继承和发扬共青团的革命传统..... (43)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或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几十年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下发展壮大。它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带领广大青年为实现党的目标努力奋斗。它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无产阶级优秀战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它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青年组织。

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名称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极大地震撼了中国先进的知识青年。十月革命使他们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之外，拯救中国还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青年运动揭开了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新篇章。

给予中国青年极大震撼的另一件事，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这个消息就象晴天霹雳，一下把中国人民、中国青年惊呆了，激怒了，也使他们觉悟了、清醒了。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四爱国运动给予中国青年最大的启示，就是使他们打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再也不相信十八世纪法国式革命能挽救中国”。

随着资本主义理想的破灭，一个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的热潮很快掀了起来，一时间，数以百计的刊物都在鼓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就成为当时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的思想基础。

1920年8月，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为了更好地在青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好地团结和教育大批优秀青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员有俞秀松、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等8人，21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上海青年团成立后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帮助各地建立青年团组织。他们及时地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在上海青年团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天津、济南等地也纷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0年11月。它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出席会议的成员有李大钊、高尚德（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女）、朱务善、黄日葵、李骏、范鸿劼、张国焘。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李大钊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也是北京青年团的组织者。他亲自入团，直接领导了团的活动。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底正式成立，其成员多半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经过五四运动考验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如毛泽东、彭璜、肖铮等，毛泽东担任团的书记。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武汉中学的10名进步学生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的，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成立大会。广州青年团组织建立于1920年初冬，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10余人。

早期青年团组织积极参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工作，在组织上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研究了在全国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会后，即派大批党员到各地做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创刊。创刊号至第3期由北京团组织主办，邓中夏、刘仁静主编。第4期迁往上海，改由团的临时中央局主办，施存统主编。《先驱》的出版，对扩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加

强对团员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统一团员青年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党的重视和帮助，由于信仰一致、思想统一，团组织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22年5月，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等17个城市都建立了团的组织，团员达5千多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青年团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大会选在5月5日召开，是因为这一天是卡尔·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革命青年组织。

上海、长沙、武昌、南京、保定、天津、唐山、杭州等15个地方团组织推选出25名代表出席大会，有蔡和森、邓中夏、张椿年（张太雷）、（方国昌）、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许白昊、谭平山、陈公博等，还有2名少共国际代表。由于这次大会是同马克思诞辰纪念日 and 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举行，因此参加大会的还有全国劳动代表和来宾，共1500余人。

大会开了6天，举行了8次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张椿年致开幕词，接着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员代表16人发表了演说。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此后，会议连续听取了团临时中央局和各地代表所作的情况报告，并且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章程》等7个文件。

团的纲领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目的是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的共产主义社会。”团的纲领还明确地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的要求。这表明，青年团在正式成立时就不仅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要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而且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首先消灭封建军阀统治，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团章规定，“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和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这就为广泛地团结、教育青年，奠定了组织上的保证。

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团之关系议决案》中，正式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作为少共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接受少共国际的领导。

大会选举了团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高尚德、方国昌、张椿年、蔡和森和俞秀松。方国昌被推选为书记。

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中国青年从此有了团结自己的核心。从这以后，青年团就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领广大青年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为中国的独立、民族的富强而冲锋陷阵，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与此同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遥远的异国他

乡宣告成立。

二、共青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正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蓬勃掀起之时。青年团成立后，立即率领广大团员青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洪流中去。

兼任湘区党团两个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先后三次到安源煤矿去，进行组织动员。湘区青年团执行委员李立三深入到矿工群众中间，举办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向矿工讲解革命道理。他还在安源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青年团员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这次罢工的领导者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当时都既是共产党员，又是青年团员。团员青年还奋勇投入了京汉铁路的政治大罢工。在罢工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揭露北洋军阀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罪行，号召一切被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奋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继承先烈未竟的伟业。

第一次工人运动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切地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在党的三大上正

式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

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团组织又有很大发展。全国已有16个省，30多个地方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已达6千多人。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邓中夏，瞿秋白，林育南，恽代英，李求实等30人左右。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一致拥护党的三大所制定的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且决定团员也可以同共产党员一样加入国民党。会议决议规定：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加入后还要服从团组织的领导。要赞成中国共产党之主张，与其语言，行动一致。“共青团在国民党中应保存独立的严密组织。”这样就保证了在统一战线中青年团与共产党能够采取一致的立场与行动。

最后，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世畸、林育南、李少白7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9月召开的二大一次全会中，决定刘仁静担任委员长，由刘仁静、林育南、恽代英、邓中夏4人组成中央局。

1923年10月20日，团中央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青年》周刊，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团中央宣传部长恽代英担任主编，团中央宣传部的秘密机关就是《中国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青年》是在极其艰苦，非常秘密的条件下出刊的，在青年中传阅时也很注意保密，发行量最多达3万份。

从1923年10月开始，团的各级组织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参加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和重建的工作。同年12月，团中央又发出通告，号召广大团员积极配合国民党改组，以助统一战线的尽快建立。同时规定：（一）各地方同志应尽量加入国民党；（二）各地方对于国民党改组事，应组织一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三）各地方若无国民党组织，应由各地委将愿加入国民党人数报告中央，以便代请国民党派员前往组织”。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它标志着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在统一战线建立的形势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5年1月26日到30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18人，代表团员约2400人。这次大会着重讨论如何贯彻党的四大决议问题。大会讨论通过了宣传、组织、团的教育和经济斗争等决议案，修改了团的章程，为领导青年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大会通过的新团章中，强调了团的民主集中制，确定了大量吸收劳动青年的方针。并且对青年入团年龄作了修改，把入团最高年龄由28岁降到25岁，规定14岁以上25岁以下的青年才能入团。大会选举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任宣传部主任。

这次大会还有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

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什么要改名呢？一是为了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各国青年团组织的名称一致起来。当时在国际共运中有两个国际。一个是第二国际，第二国际领导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青年团叫社会主义青年团。再一个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叫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一建立就正式加入了第三国际所属的少共国际，这次改名就从名称上同第二国际划清了界限。二是为了表明我们团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为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青年组织。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郑重的宣布：“我们决议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的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会后，青年团以新的姿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为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竟然向工人开枪，打死了工人代表顾正红，打伤了10余人。这一事件就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惨案之后，上海学生首先起来援助工人，并呼吁全国各界援助。但帝国主义巡捕却无理地逮捕学生，激起了各界人民的更大愤慨。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租界当局准备审讯被捕学生的5月30日，举行反帝示威。团

中央在任弼时的主持下立即作了行动布置，恽代英亲自担任了上海学联五卅反帝示威的总指挥，领导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和上海学联积极开展反帝宣传，发动群众参加五卅反帝示威。

5月30日，大批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讲演，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帝国主义巡捕又一次大肆逮捕学生。于是学生和群众数万人纷纷聚集到英租界巡捕房门口进行抗议。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头目悍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10余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天深夜，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全国各阶层当中去。6月1日起，从上海掀起的反帝怒潮迅速扩展到北京、天津、武汉、南京、长沙、南昌等30多个城市。各大城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先后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

在这次斗争中，团中央领导人任弼时，恽代英，肖楚女，林育南等都亲自上街参加示威游行，并且登台讲演。任弼时还写了《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指出，中国学生“负有民族革命的绝大使命”，“应不惜本身的牺牲去为民众利益而奋争。”广大团员青年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毫不畏惧，表现了中国青年威武不屈，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罢工的工人有55万，其中一半以上是青年工人。在这期间由于积极参加斗争，共青团员被帝国主义，军阀逮捕的有200人以上。

国共合作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但却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和仇恨。他们不断采取上书、检举、弹劾等手段攻击共产党人。统一战线内部，围绕着领导权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激烈。

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利用孙中山刚刚逝世的机会，以阐释中山思想为名，连续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提出一整套反对国共合作，分裂统一战线的“理论”。戴季陶攻击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实行“寄生政策”，意在“篡夺”国民党。他说，“要图中国国民党之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须具备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妄图把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变成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工具。在戴季陶主义的影响下，广东一部分学生和军官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接着又组织了学联，积极在学生中进行分裂活动，企图夺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

戴季陶主义出笼后，共青团配合共产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肖楚女、恽代英、瞿秋白等在《向导》，《先驱》，《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论述深刻、批驳有力的文章，从政治上、理论上逐条批驳戴季陶主义，彻底揭穿它名为阐释孙中山的思想，实质上却是曲解、阉割孙中山的革命灵魂，破坏革命的险恶用心。为了保证在与右派势力争夺学生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共青团还在组织上采取了积极的策略：在右派势力小或没有右派势力的地方，加紧巩固学生的下层组织和进行反对右派势力的

宣传斗争；在右派势力已经形成一种组织力量的地方，如上海，北京、广东、四川，就一方面加紧思想上的斗争，另一方面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去争取他们的群众。结果，在组织上也取得了很大胜利。

除了戴季陶主义外，在青年运动中还出现了以国家主义派为首的鼓吹国家主义的反动思潮。国家主义派是以曾琦、李璜等一部分留法学生组织的“国家主义青年团”（即青年党）。因他们曾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宣传自己的主张，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他们回国后，同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一起在上海出版《醒狮》，《国家与教育》等刊物和一些书籍。他们以爱国者自居，实际上他们对外不反对帝国主义，只反对苏联，对内不反对封建军阀而反对共产党。他们诬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不爱国，是“苏俄走狗”，相反大肆吹捧北洋军阀，胡说什么“凡是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等。

对于国家主义派散布的谬论，共青团以《中国青年》为阵地，给予了坚决的批判。1925年和1926年，《中国青年》有33期刊登了45篇批判国家主义的文章。例如，恽代英撰文指出：“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要为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文章还指出，在五卅运动中，最爱国的正是被国家

主义派所指斥的“无祖国的工人”，而所谓有祖国爱祖国的国家主义者，却在那里大喊什么“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丧失了起码的爱国心。这就揭露了国家主义的反动本质，进一步维护了无产阶级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人，大举出师北伐。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三大军阀共有兵力70万。针对敌强我弱的特点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北伐军采纳苏联顾问的建议，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最后讨伐张作霖。根据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北伐军英勇奋战，节节胜利，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就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主力部队数十万，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广大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学员很多是党、团组织从各地动员来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其中团员就有500名，他们很多人后来成了北伐军的各级指挥员。为北伐战争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叶挺独立团，就是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这支年轻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当先锋打头阵，一入湖南，就克攸县，下平江，稳定了湖南战局；接着直逼湖北，占领汀泗桥，贺胜桥，夺取武昌城。英勇善战，所向无敌，被人们誉为“铁军”。

团组织还领导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支援前线，有力地配合

了北伐军的军事进攻。例如，江西安源团地委为排除北洋军阀设置的路障，组织起300多名青年工人，抢修湘东大桥，为保障北伐军的后勤供应，他们组织了以青年矿工为主体的运输队，帮助北伐军将枪枝弹药一直送到南昌城下。1926年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由于吴佩孚派重兵防守加之城墙坚固，北伐军久攻不下伤亡甚大。叶挺团长决定从火车站挖地道通到城下，放炸药炸塌城墙再行进攻。于是，安源团地委又组织100多名青年工人立即开挖地道。青年工人以顽强的意志一刻不停地挖，很快将地道挖到城墙下面，为北伐军炸开城墙，攻克武昌立了首功。又如，为了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上海的广大团员青年参加了党领导的3次工人武装起义。上海大学和复旦、暨南、大夏、交通等大学组织了学生纠察队。有的学生上街宣传讲演，散发传单；有的学生和工人合作，拆毁铁轨，有的学生上前线救护，还有的学生到阵前对敌人喊话。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学生又组织了慰劳队，慰问工人纠察队。在整个北伐战争期间，团员青年的这种英勇无畏的支前行为举不胜数。

此外，团组织还发动团员青年参加了党领导的其它各种斗争。在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中，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团组织，在协助党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土豪劣绅，开展文化教育，破除宗教迷信，进行乡村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共青团在北伐战争中还开展了少年儿童工作。要求各地建立童子团。在团中央的号召下，在各级党团组织以及工会、农会、学联的积极